

胡適李濟交惡？

楊樹人

——胡適之書信一束(下) (本文插圖刊第25頁)

胡適被圍剿的困擾

民國五十年暑假，我把我在科學會的擔子推給了徐公起先生（我用個「推」字，因為他也並非完全自願，只是擺脫不了朱、胡兩先生的羅致，勉為其難。這一點，我私人且感且愧）。

假期快完時，我會去山中住，亦未能久留，因為轉瞬秋季開學之故。

其時外界盛傳有「圍剿胡適」之說。有些不負責任的分子，捏造故事惡意攻擊；另有些喜於舞文弄墨之徒，借題發揮，加油添醬，顯示其善於炒陳飯的手藝，以期吸引讀者對於他們自己的注意。研究院裏面亦有所際糾紛，不服胡先生秉公處斷之勢。於是我又接到胡先生下面的來信：

樹人兄：

這一個多月以來，總想找你談談，總覺得你的身體不好，我不敢打攪你，所以總沒有開口約你談談。

明天（廿七）或後天（廿八），你若有空閒時間，我盼望你能到南港來吃晚飯談談。六點或六點半都好。請你定個日子，我派車子來接你。不光是中研院的一些事要請教你，我還想聽聽你談談清華的一些問題。

敬問 雙安

弟適之

五十、九、廿六夜

第二天晚間，我在南港胡先生的寓所，曾會長談。所謂「清華的一些問題」是起因於一個學生選我為導師，經常談話。他是清華大學一個機要辦事人員之子（我事前不知），曾向其尊人報告一些我所做的指導，恰好其人不到科學會公洽，日久相熟，便透露一些外面聽不到的消息。我會向錢校長談及，大概他向胡先生報告，引起談話的興趣。現在日久，已不切記當時所談何事了。關於院務，胡先生隱約其辭，欲言又止，不肯明說。他向有修養，但是那晚，面色似有隱憂。後來，我發覺烟灰盤內竟累積烟蒂十餘枝，我只得婉詢究竟，他才說出，現任總幹事在中秋節前，就要出國進修，總務主任也表示不再問事，行將無人為他做事。言外之意，他好像是陷於窘境。我這才明瞭，覺到研究院同仁，未免過分，同情之心，油然而起。我憑經驗，感覺並非不可解決，立刻保證負責處理，先安其心，待次日查明情況，再為報告。他滿面愁容，一掃而空，連聲道謝。我辭別時，已在深夜，他佇立階前，望我登車，這一幕情景，至今恍如目前。

翌晨，我用電話向同仁詢問，得悉行政院實施分批撥付經費辦法，各所競爭購置器材，超出已到公款，供應商人在中秋節前急於收帳，引起

困擾。我立刻勸告總務主任同仁不可推卸責任，至少也須了却經手案件。我同時表示每星期一、三、五日下午到院，會同他與各所採購庶務同仁，分別按照各所經費及所購置案件，釐訂優先次序，儘量付款。超過部分，向商人接洽，下期優先償還。此後不得超出公款採購。此項辦法報告胡先生後，他為之釋然。

幾天以後，收到胡先生下列來信。

樹人兄：

謝謝你幾天的辛苦！

昨天三個小報的小報告，牽及老兄，使我十分不安。我也受了點小連累，接了許多電話，發表了幾次談話。今天報上登出我的話，沒有大錯嗎？

這點小亂子也可以幫我說明：我所以幾次多番懇切的求你來做我們的總幹事，正是要你來坐鎮在這裏，人人都敬重你，都佩服你的精細，都信任你的公道，一切問題就都不會發生了。

我今天十分誠懇的請你再考慮我那天大致說過的幾點：

(一)請你擔任中研院總幹事一年，或八個月。最好是一年。我相信李先聞兄身體休息過來之後，我可以請求他接你

的手。

(二)你若能每週來兩個半天，或上午，或下午，就夠了。

(三)我想，有萬紹章、王大文兩兄幫你的忙，秘書、會計兩個方面可以使你不用多操心，你若能來，一切都可以「變活」了！

總而言之，我在這一個月裏，雖然故作鎮靜，其實時時感覺不安。我們着實需要一位有度量而又有大才能的楊樹人先生來坐鎮一個時期，這是我請求你重新考慮的一個迫切問題。

適之

五十、十、五日下午

我回復說，我已定期到院協助同仁解決問題，一直到李先聞先生就任為止，實不需再加一個總幹事名目了。

胡先生不久心臟病再發，住入醫院。年底，院中經費，除去開支，尚多餘十幾萬元，可以安心度歲。我將這個消息，在病房向他報告，他完全滿意。

出院以後，爲了醫護的便利，他移居市內。由於他依然盡力院務，未能徹底休養，又兼氣血惡劣，終於次年院士會議後茶話會散會時仆地不起。

在他逝世後第三年，我曾撰文，記述那一段時期有關的情況，無須重複了。

胡適先生無意組黨

現請補寫當時二三事的回憶。

科學會涉及多方面的人與事，有時亦不簡單，請舉一例。一次，教育部李熙謀次長藉口美方催送相對基金項下的補助方案，需要剋日發出，抱着全部的方案，到病房請梅部長立刻決定。梅部長也就略加翻閱，逕予判行。或者根本不知道，各案尚未經過科學會最後通過，事後，科學會接到美方通知，得悉李君擅自增加交通大學的補助。交大在臺復校需要較多經費，科學會本來從寬核定，但是這種手法，顯然不當。胡先生當時甚爲震怒，這是我少見的胡先生大怒。他說，何以不讓科學會知道？他本人現在臺北，不管時限如何迫切，何以電話都沒有一個？錢校長也表示，「再如此胡鬧下去，他校長也不做了，並且不在公立學校教書。」

再舉一例。一次行政院例會，陳誠院長說，現在胡適院長去美國，梅貽琦部長住在醫院，科學會究竟誰人負責？是否即由浦薛鳳次長，和楊樹人執行秘書兩人逕自決定……像股海光這樣的人竟然得到研究補助。浦次長因爲事出突然，報告此案可以立刻查報，等到院會討論其他問題時，浦次長抽暇向我電詢。我說明，股海光本名福生，他在學校教書用本名，海光是他寫政論文章的筆名，一般人很少知道他的本名。不過股福生受補助的研究題目是一個專門性的哲學課題，和他一向在報紙雜誌所寫的文章，沒有直接關聯。科學會曾送請兩位哲學教授審查，認爲可以成立，才通

過給予補助的。在行政技術上，科學會難以根據股海光的非學術性的文章內容而否定股福生的可以成立的哲學研究專題。浦次長問能否將本案資料迅速送院。我答應三十分鐘以內，專差送達。浦次長收到後，本擬當場舉手提出報告，但是行政院陳雪屏秘書長深知院長個性（或係了解內情），恐怕演成僵局，急示以目，勸勿發言，只好不了了之。其實胡適院長赴美，科學會主席一職曾委託王世杰先生代行。梅貽琦部長雖在病院，神志清楚，部中各單位首長，經常到病房請示，他的圖章即在枕下，公事隨時判行。浦次長如何能獨斷？至於我執行秘書，更從未執行過未經委員會通過的案件。然而，政治上的言論，根據什麼報告，以及應付什麼環境而發，各有背景，往往絃外之音，別有用意，難於深究。爲了公事，有時只能分外容忍，委曲求全了（科學會後來體制略有改變，經費比以前充裕。近年主持之人，少壯有爲，成績斐然可觀，陳院長辭公在九泉之下，當可含笑了）。另有一事，就是少數熱中的政客強求胡先生領導組黨的問題，這與科學會的業務，全不相干。不過，由於胡先生是科學會的主席，科學會又有小款補助學人和學術機構，就有人發生幻覺或妄覺，注意科學會的一舉一動，所以我分外小心，凡事完全公開。我們唯一的錄事是安全室主任推薦來的，我特別訓練他，如何分類並裝訂檔卷，不但保存，而且要經常維持，使其成爲活檔。我又指導他如何使用檔卷櫃的密碼鎖，凡事開櫃取檔，一目了然。教育部派來的兩位同仁也能了解我的個性，推誠相處，他們

也能要求錄事，隨時開櫃調卷。我們好像住在玻璃房屋裏服務，可是並不能阻止若干人，繼續在做夢。由於胡先生一向主張自由，提倡民主。回國就任院長以後，一羣無聊政客便以為可以簇擁他為護身符，組成一個新的政黨，並且千方百計，強求胡先生出面。殊不知胡先生根本不願組黨，更不會為這一羣人「牽着牛鼻子走」。

早在大陸淪陷以前，朱驢公會奉命邀請胡先生出任行政院長，他斷然謝絕。這是朱先生親口告訴我的。胡先生如果重視權位，他垂手可得，焉用組黨。

在大陸淪陷後，蔣廷黻代表在聯合國裏的外國朋友（尤其是英國代表）對他說，國民黨過去的功過，不必細究。長期執政，總與英美政治習慣不合，唯今之計，宜於別有號召，令人耳目一新。聯合國裏中華民國的朋友，也才能易於幫忙。蔣代表審度當時情勢，認為不無理由，乃以組織新黨一事與胡先生相商。由於胡先生未明白反對，蔣代表便以為胡先生同意其事，積極進行。等到大致就緒，一再懇請胡先生領導，他終於拒絕其事。這是胡先生親自對我說過，並且說明，當年蔣代表在那種情勢之下，邀請出面，尚且不為，何況今日這些人。

所以在那一羣政治販子，鬧得烏煙瘴氣的時候，我深知他們是在做夢，愚昧可憐。

「無知小人之所為耳」

有人詢問胡先生，他既然提倡民主，何以又不願出面組黨。他說，此時此地，如由一羣有名

望，有風度，有卓見的教授們，組織一個政黨，目的不在於爭奪權位，而是提供諍言，協助當局，集思廣益，砥礪前進，倒是理想的。

這原是他的假想；也可算是他對那些利慾薰心的政客們的教訓；也或者是他能預見後來那些遊行示威，聚眾鬧事的不法變態行為，有感而發，並非真正鼓動教育界人士組黨。不幸，竟然有小心眼的人物，認為這就是胡先生的意向。

據說，有人認為，那些公然呼號組黨的烏合之眾，不足為慮。如果胡先生真的聯合若干教授組黨，並且將黨的後勤工作交付楊某，那將是一股可畏的敵對勢力，這自然是夢囈之談。他們不知胡先生絕無意組黨，已如上述，真正有政治興趣的教授，寥若晨星。他們也不知我楊某根本連研究院和科學會的工作，都一直在設法辭脫，更不會捲入任何政黨。

這些人真是庸人自擾，還更進一步，布置陷阱，暗箭傷人，以便必要時，先「整頓」我楊某。事與王雲五先生及其出版事業有關，我本可置身事外。他當時身任行政院副院長，不知因何理由，不欲自行處理。我覺得太不像話，經查明確證以後，自行提出書面，直接向警備總司令部抗議，得到副總司令李立柏將軍的覆信，暗示是另一個權力機關所發動。經過轉請覆議，雖說當事人不肯完全認錯，但是其原來的捕風捉影，已經拆穿，我的危害可以解除，我也不再追究。

事後王雲五先生索閱往返書信，親筆覆我一信說：「此乃無知小人之所為耳。」（此信現尚保存在我書架的頂層）

「無知小人」自然是一個可能，但是或尚有其他可能。我早年服務外交，年少氣盛，曾和史大林的格別烏、希特勒的蓋世太保、日本軍閥的特別勤務作過遊戲，對於潛伏的分子略能識別，其實，這種分子太多，稍加留意便可發現。

例如于右任的女婿就是共產黨，邵力子妻子也是共產黨，廖仲愷為共產黨所殺害，他的遺孀竟能「左傾」，讓他們的獨子加入共產黨，宋慶齡死後，共產黨追贈黨籍，暴露了身分。近年發現，甚至陳布雷的么女兒亦是共產黨，軍事機關潛伏的共產黨衆多，更是廣知之事。我在駐蘇大使館服務時，女館員胡濟邦便是公然為共產黨工作的分子，她會擅離莫斯科到開羅和史諾(Edgar Snow) 同居三個月，商務專員胡某亦「私」通蘇聯破壞國家利益，我曾公開斥責，他不敢抗辯，資源委員會的吳兆洪，我早在民國三十六年就發現他與共黨勾結，並有媚俄的行為。果然三十七年底三十八年初，他布置了資委會集體靠攏，三十八年初孫越琦參加所謂「講和」內閣，出任經濟部長，曾軟硬兼施，千方百計，要把我困留在大陸（想係奉命而為），終為我抵抗擺脫。在臺灣，我住宅的緊鄰原先就有兩個人物，和共產黨有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其中一個對先總統蔣公用極污穢的字樣，向我挑撥，另一個經常竊聽我與鄰人的談話。當年臺灣雖因警備部的有效組織，使這些分子不敢公然抬頭，但是潛伏活動仍然不少，可能故意挑撥，製造糾紛，因此我頗有戒心。

其實，共產黨清算屠殺其利用的爪牙甚至其

「同志」，不勝枚舉。所以這些人，從廣義看來，也是一千「無知小人」，不過他們為害的性質，又異於一般的無知小人了，不管是那一類的「無知小人」，我都不應落入他們的圈套，所以我默察情勢，寧可隱惡，不再計較。而今二十餘年以後，這種陳事，本不值得細談，只是說明我在科學會服務時所惹起的一些意外糾紛而已。

儒家傳統處事基礎

我與胡適之先生，思想並不盡同，學問範圍，亦有區別。本非「朋友」，亦非「師生」，很可能終生不遇，乃因機會，能為這個偉人略效微勞，在他光輝生命的最後三年，朝夕相處，並且建立起深厚情誼。他與我長兄年齡相仿，我對他的恭敬，甚於我的兄長，他對我的愛護，也周到備至。如說是「兄弟弟恭」，或猶近似，恐已非「朋友」或「師生」等等所能涵蓋了。若問其間的共同基礎何在？說來亦甚簡單，就是傳統的儒家風範。胡先生儘管提倡「儘量西化」，那只是他的國是主張。他的「說儒」一文雖說對於「儒家」有所批評，但是據我體驗所及，他為人處事，仍然是一派傳統儒家風範，其原因亦不難尋覓。在他幼年啟蒙時期，他的尊人曾特撰「學為人詩」，這冊歌本現藏胡適紀念館，其內容是純粹的儒家思想。他在「四十自述」中所描寫的他的令堂，也是典型的傳統母性，儒家精神早已深入骨髓。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雖然接受西方文化，其為人仍然具有濃厚的儒家氣質，只讀他所寫的修身課本便可知其梗概，胡先生與其相處多年

，必然互有影響，共同形成風氣。

我的先君為我講授經學，我的先母秉性仁慈，教我循規蹈矩，我自幼即在這種思想中長大成人，了解「忠恕」的意義。胡先生曾說這是孔門的治學方法，我則認為亦是為入之道。忠字是對自身的要求，一切從嚴，無論是忠於國家，忠於長上，忠於朋友，忠於職守，不可絲毫差錯，恕字是對人的要求，不妨從寬，只求大致如意。這兩點，胡先生都能做到，令我肅然起敬。

我先君為我講孟子，着重仁義，所謂惻隱之心，就是現代人所說的同情心，所謂羞惡之心的「義」，韓文公訓為「行而宜之」，也就是正當與公道。胡先生出任研究院院長，是官方禮聘而來具有特殊意義，不幸因小人挑撥，發生誤會，以致不遂初衷，情況本來尚不嚴重，無奈以後的環境，日益惡化。我目睹一位名滿天下的傑出學者，在垂暮之年，竟然如此窘困，不但有同情之心，而且亦認為不甚公道，因此雖非自願，亦略盡微薄。我幼承儒學，其後涉獵西方哲學，默察歐美國情，慎思明辨，肯定孔孟思想。縱然不能完全做到，總勉力而為，視為做人之道，求其實踐，這是自己的要求，並非有私於胡適之先生。我們的關係，便是在這種共同基礎上，自然發展出來的。

李濟口中「揚州九怪」

李濟先生生前見我，常提起「揚州九怪」的新名詞。他說，揚州文人前有八怪，今加楊某，應為九怪（編者按：楊樹人教授係揚州人），他又說：「想你不來時，你竟來了，料你當去時

，你又留下了。等到堅留你，你又去了，以為你不當出面時，你又來了。來去無踪，神龍不見首尾，此其所以為怪也。」

揚州八怪，才藝傑出，下走魯鈍，豈敢高攀，而且他們也確各有癖好，我則無之，難以稱怪，不過人的眸子，各有色彩，所見亦異。李先生所說，就其本人經驗，或亦近似。當他與周鴻經先生交惡時，無人敢代理總幹事一職，下走竟然拒絕不了朱驥公的邀約和周鴻經先生的懇求，允以九個月為期（我到院以後，才自同仁處聽說李濟、周鴻經衝突，已達到快去淡水河邊決鬥的階段）。第二年暑期，朱驥公有事，李先生料我時限已到，可能縮手的，我竟然留下了（我事後發覺，李先生很可能曾參加不利於朱驥公的活動）。等到他奉命為胡先生代理院務，設法扣留我的時候，我又走脫了。後來他和胡先生意見相左，而且在院務會議席上公然齟齬的時期，他以為我事不關己的，孰知我又奮勇，為胡先生疏解，他說我來去無踪，好像略有根據。更想不到，直到胡適之去世後，我還為李濟之，胡適之兩先生解圍一次。由於胡適之的棺柩運回南港時，李濟只允停在史語所的倉庫，院中年輕同仁公憤，擬對李濟動武，經我勸解，另商近代史所六位研究同仁讓出小會議室停放，這纔息事。我本非龍，亦不具龍的首尾。所謂來去無踪，不過是實踐儒家行而宜之的道理，自求心安，李先生言之過矣。生於今世，我或不免迂腐之譏，然而擇善固執，亦惟有自行其是了。有許多事，我尚不能全寫，已嫌冗贅。敬請擱筆。

七十六年四月十六日